

文物有灵

串起故宫和重庆的85年情缘

——专访《故宫文物南迁》作者祝勇



孙佳妮 摄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六百年》《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担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个影视奖项。

□本报记者 赵欣 实习生 江之韵

“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踪影。”从2002年的第一本故宫主题作品《旧宫殿》出发，作家祝勇开始与故宫持续对话。20余年来，“故宫”已成为祝勇鲜明的文学标签。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90周年，祝勇的故宫写作系列也迎来了新篇。近日，他的新作《故宫文物南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写作历时两年，对祝勇而言，“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征。”南迁旅途漫漫，重庆是其中重要一站。“作为一座伟大的英雄之城，重庆见证了故宫文物南迁史上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时刻。”日前，祝勇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历史壮举

“故宫文物南迁的伟大在哪里？它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文化遗产保护性转移”

时间回到1933年。山河破碎，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的目光中，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破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那场大火，以及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

为防日寇劫掠，以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一万多箱国宝踏上上路，时延十数年，地逾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艰辛。“今天来看，南迁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但在当时，关于是否迁还是留曾引发论战。”祝勇说，北伐大将李左翔曾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有人甚至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在铁路放炸药炸掉。

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历经一番艰难论战，最终，文物南迁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1933年，故宫人带着13427箱零64包文物离开紫禁城，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他们同时携带了古物陈列所、颐和园等处文物共计19621箱72包零8件，克服九九八十一难，把文物护

送到远离硝烟的大后方。又在硝烟散尽之后，带着大部分文物平安归来，从而铸就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伟大奇迹。

“故宫文物南迁的伟大在哪里？它是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最深远、文化遗产保护性转移。然而，当后人对于这个奇迹唏嘘不已时，故宫人往往很平静，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祝勇感慨，“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90周年，90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

结缘重庆

“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

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始于2010年。“2010年6月，故宫博物院发起‘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南迁路’考察活动，沿着当年的南迁路线，寻访了4省8市37个重要的故宫文物存放点，重庆是其中重要一站。”祝勇说，2019年，在王旭东院长等院领导推动支持下，以郑欣淼先生作为首席专家，牵头“故宫文物南迁史料整理与史迹保护研究”学术项目，“我担任子课题‘故宫文物南迁记忆再现与重构’的负责人，开始系统性地重走南迁路，并构思写一本书，这个过程里，愈发深入了解到故宫与重庆的情缘。”

写作《故宫文物南迁》的过程中，一张黑白老照片深深拨动着祝勇的心弦。照片写着“故宫博物院旅渝同人南泉修禊留影”，拍摄于“卅六年春初”。“这是1947年初春，故宫南迁人员与眷属在重庆南温泉的一次郊游。此时春和景明，抗战已胜，南迁存于西南诸省的故宫文物将集中重庆后迁回南京，照片上大人孩子神态轻松，有的还笑容绽放，这大概是南迁史上故宫人内心最安定的一段时光。”

“后来我认识了庄灵先生，照片上他还是个9岁的孩子，他帮助我在书中准确地写下了照片上每个人的名字。那些名字值得永远铭记。”在祝勇看来，从1938年1月故宫文物陆续抵渝开始，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再到1947年故宫文物陆续由重庆集中运回南京，这是一段长达近十年的辗转史，也是作为故宫文物存放地和中转站的重庆与故宫人同呼吸共命运的一段血泪史、心灵史。

这些年，祝勇曾多次来渝考察、寻访故宫文物南迁相关地点，足迹遍及渝中区、南岸区和巴南区。每每与朝天门川康平民商业行、玄坛庙安达森洋行遗址、临江门合记堆棧和王家沱吉利洋行旧址，以及飞仙岩矿场遗址、南温泉等南迁史迹面对，他的心中都波浪汹涌，思绪总不由自主地飞回那个年代。

“当时，重庆各方面对文物南迁工作都积极配合支持。”祝勇介绍，川康平民商业行仓库是故宫文物抵达重庆后最初的存放地之一，银行腾出了它的地下金库，那里有一道德国制造的钢板密码门，据说可防炮弹。可是还不够放，怎么办？于是又租用了长江对岸的安达森洋行仓库。据说当时仓库里还存放着腊肉，为了给文物腾空间，洋行老板瑞典人安达森带着重庆味道的普通话命令：把仓库里的腊肉全都甩了。

祝勇认为，对故宫文物而言，重庆是一处值得信赖的港湾。“查找重庆大轰炸史料时我看到一张照片，一栋楼被炸了半边，另一半还继续营业。我还记得一副大轰炸时的对联：早也跑晚也跑一天到晚都在跑，跑得脱跑不脱看来要把命要脱，横批：安心睡觉。我想，重庆能成为英雄之城离不开重庆人的乐观精神。战时重庆用有限的物资条件和巨大的乐观、包容精神滋养了坚守抗战的人民，更为文物南迁这一保全中华文明的重大事件提供了坚实支撑。”

故宫写作

“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因为故宫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后来就逐渐成了我的写作主题”

“故宫是最好的历史现场，是我写作的灵感之源。故宫不只是我的写作对象，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而《故宫文物南迁》正是我立足故宫观察中国史的一次全新尝试。”祝勇说。

从2002年的《旧宫殿》算起，《故宫文物南迁》已经是祝勇笔下第11部故宫主题作品了。“真的是一步步走来，不断围绕故宫去拓展、深化，特别是2011年我进入故宫工作以后，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学习，逐步深入，于是心中关于故宫的面貌也愈发清晰。”《故宫的古物之美》描绘的是器物文明；《故宫六百年》则是恢宏的全面抒写；《故宫的风花雪月》试图通过一幅幅书画作品展现那些夹杂在宫殿内部的形形色色人物命运……二十余年，洋洋洒洒几百万字，祝勇构建起的“纸上故宫”，亦成为当代文学一道风景线。

为什么是故宫？在故宫写作开始之前，祝勇一直沉迷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游走神州各地，写作了大量文化散文，“慢慢地我觉得需要一个写作的聚焦点，就像鲁迅有绍兴，沈从文有凤凰，莫言有高密东北乡，这个聚焦点也是作家的‘灵魂的根据地’，他能够通过它对大千世界的认识表达出来。故宫的美我怎么都看不够，因为故宫的确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方方面面，后来就逐渐成了我的写作主题。”

写作故宫多年，祝勇的文字是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而《故宫文物南迁》则是与以往很不一样的创作实践。“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文物南迁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则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缘何能够携带着将近两万箱文物奔走于道途，在连天的炮火中，保护了中国文明史上的无上珍品，使中华文明的长河不被战争截断？”

从历史的吉光片羽中寻找答案，这本新书的写作耗时超两年。“南迁规模很大，历史资料浩繁而零散，迄今还没有一部集中的故宫文物南迁历史资料汇编，没有这个总汇性的档案，那么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找。”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故外，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职员后人；还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成都、乐山等地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岁月。

“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写作的深入也让抗日战争的浩大图景在祝勇眼前层层展现，他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牺牲精神。“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他说。

密切互动

“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心，与两千里之外的故宫结下的缘分成为重庆的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现在故宫与重庆的互动依然非常密切”

谈及故宫南迁这一事件对于重庆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祝勇坦言：“毫无疑问，故宫南迁历史为重庆历史文化写下了厚重的一笔。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心，与两千里之外的故宫结下的缘分成为重庆的城市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所以现在故宫与重庆的互动依然非常密切。2019年，故宫博物院王旭东院长到任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就选择了重庆，考察内容正是故宫文物南迁历史。2021年6月，在故宫博物院支持下，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在安达森洋行旧址正式开馆，这是首个在故宫文物南迁遗址内设立的主题历史纪念馆。由此，百年洋行重获新生，国宝皮藏地也将一段尘封的城市记忆唤醒。”

作为国民“顶流网红”，故宫有着强大的经济变现能力和热门曝光率，重庆未来如何利用故宫南迁历史文化资源，祝勇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南迁为抓手，利用南迁纪念馆的平台举办研讨会、讲座等。将来有机会，故宫博物院的南迁主题原创话剧《海棠依旧》也可以带到重庆，打造现场版，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等。因为当年国宝的南迁和迁回都途经重庆，这个挖掘的空间可以说相当巨大。”

带我们一起回望历史

——《经典里的中国》读后

□邹安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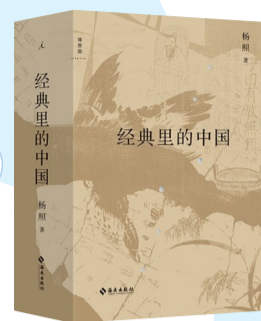
自古以来，在世界屋脊之下，在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之畔，华夏先民们逐水草而居，村落、城邦由此而兴起，文明也从此衍生和发展。从文字符号高光闪现的那一刻，先民们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与前行的社会一道，随同岁月不断沉积，并被一本本的传统典籍所珍藏与记录，成为历史的遗存。

一部中华史，文化是灵魂。中国是人类文明中的奇特状态，世界历史上找不到另一个例子，同一套文字同一套符号与意义结合的系统，历时五千年而没有断裂消失，让我们可以从经典中窥见数千年前的中国。所以，当手捧台湾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杨照的这本《经典里的中国》时，看他如何解析《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老子》《荀子》《战国策》等十部经典，顿感如沐春风。

深入卷本，你会看到，《诗经》中传唱千年的民歌，《战国策》里古代中国的“权力的游戏”，《尚书》昭示中国古代政治启蒙的关键时刻，《左传》记录封建秩序的日薄西山，《论语》展现活波泼泼的师生关系……一幅幅古代思想与生活世界的精彩写实图景，让读者一窥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作者有理有据的深度对比、互相关联，有点有面，有血有肉。通过一个个实例，人物的鲜明对话或者活动，真实历史事件的再现等，呈现出一面面社会的镜子，映照出历史跨越前行的足迹。

比如，读过《礼记》后，我们会对周代的礼有较深入的了解，也就能从礼的角度去看《孟子》书中关于性善的主张，体察出性善论和周代王官学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

且读且思，不禁感叹于作者丰富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也仿佛在一刹那间复活、苏醒。孔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宛如一幅鲜活生动的长卷图，在眼底一一展开，直击柔软的心灵最深处。



此时的作者本人也好像一个画家，点染丹青，对着五千年的华夏山河挥毫泼墨，绝不拖泥带水，一气呵成。沉静下来，手捧卷本，从第一章看到最后一个字，脑海中呈现出出来的场景，就像华夏地势的高低起伏，既有巍峨挺拔的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也有长江、黄河一路滔滔奔流至东的茫茫大海。

总之，跟随作者的思路，在其巧妙的“历史式读法”和“文学式读法”引导下，通过对这十部经典的部分章节的逐字逐句解读，本书还原经典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脉络，展现出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面对现实变化提出的因应之道，勾勒学派代表人物有血有肉的个人形象和个性及其现实活动。

同时，通过还原，让我们领略到经典所展现的思想和时代精神独特魅力，既因为古今时代境况差异而激发个人的思考，又因为古今相同而感同身受，汲取古人先贤应对生活的伟大智慧。这些产生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献，记录的都是人的经验与感受，我们今天也就必然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与其经验、感受彼此呼应或对照。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对历史的回望，也需要对优秀文化加倍珍惜和典藏。

所以，打开这本《经典里的中国》吧，它用经典解答了什么是中国。

爱会绵延传递

——小说《中师儿女》读后

□罗毅

乡村学童艰难求学、乡村教师艰辛育人的故事，充满着积极的正能量，引人向好向善，尤其对于刚刚踏入社会初就业的年轻人，具有较好的励志、启示与教化作用。

这是读完重庆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师儿女》后，得出的一些感想。

作为《我是中师生的》姊妹篇，《中师儿女》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那一批朝气蓬勃的江津师范毕业生志愿申请到山区小学任教的故事。作者曾维惠有着二十余年的乡村教师经历。她十分珍惜那一段人生华彩，尤其珍视在“挂在半山腰上的小学”当少先辅导员的经历。山区小学硬件条件的落后、农村孩子赤脚上学、中午吃冷饭的辛酸往事，如影随形，让作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着眼中师儿女“甘做春蚕蜡炬，毋忘国运民情”的理想抱负，冲着中师生忠诚、勤奋、奉献、坚毅的优秀品质，作者以自己和中师同学扎根山区教书育人的难得人生经历为原型参照，创作出又一部关于中师生的长篇小说，带给读者特别的审美与阅读愉悦。

作者用30万字、24章加尾声的篇幅，叙述了山区小学教职员工的艰辛，塑造了柏林区沙河小学江月、李心雨、代杰、莫安萍、梁兴盛、杜大星等一批扎根山区投身教育的人民教师形象。作品具有鲜明的儿童文学特征，可读性、趣味性、文学性强，作者一如既往地耐心讲故事，娓娓道来之中，诉说了中师儿女这一特殊群体对农村教育爱的奉献。

在一学期又一学期的时光更替中，中师生们克服了远离家乡亲人、日复一日爬坡上坡接送学生、保证孩子不失学去家访却因家长偏激而受委屈等困难，用所学知识技能，把懵懂无知的孩子教育成知书达理、充满爱心、积极向上的学生。在一年又一年开学、放学、农忙假、帮助贫困儿童等“凡人小事”中，中师生们固守山区，扎根农村，以山林、浓雾、泥泞、风雨、孤独、寂寞为伴，无怨无悔。

全书可以浓缩为一个大大的爱



字。不论是为解决学生中午吃冷饭而学着打蜂窝煤球帮助学生热饭，还是自费为学生缝制雨衣、用第一次领到的工资为学生购买替换的衣服鞋子、用稿费为学生订阅书报；不论是农忙假时主动上门帮助贫困学生家庭挖红苕做红苕粉、四处写信求助帮助农民卖红苕粉，还是坚持多年背疾儿童上学放学、免费为学校周围农民维修电器……都体现了作为师长的中师儿女们对职业的尊重和对学生们的浓浓爱意。

山区学校平淡无奇的生活，在作者笔下，也充满乐趣，如孩子们放学路上背着背篓割草、捡柴；冬天孩子们提着火笼上学，为了驱赶寒冷课间做“挤油渣儿”游戏；年轻的教师们课余时间钻山洞、踏秋、摘映山红、捡野生菌等等，也是作品中独特呈现并让人忍俊不禁的精彩细节。不仅如此，山区学生家长对老师们也是尊敬有加，朴素的农民常为老师送柴火、送蔬菜，有爱心的学生娃为老师采摘刺梨和板栗……这些互敬互爱的故事，真实可信，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正如书中田翠老师所说，“我在山区工作近二十年，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能够做的，只不过是每天关心孩子们过得开不开心，有没有把知识学懂，每天处理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正是这些毫不起眼的“鸡毛蒜皮”，才有了农村教育的接续传承，才夯实了“三农”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石。让我们向千千万万的中师生致敬吧。



1947年，故宫南迁人员重庆南温泉合影。（受访者供图）

